

## 前言

# 娜拉出走之後

正如大多數愛情電影都終結於男女主角步入「婚姻的殿堂」，很長一段時間裏，對政治發展的分析也大多終結於「民主轉型」的時刻。許多人似乎相信，「民主轉型」意味着政治發展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正如人們假定男女主角手牽手以後會是「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這種假定的一個後果，就是很長一段時間裏，「政治轉型」研究主要都是政治轉型的「動力學」研究。無數學者着力於分析為什麼民主轉型得以發生，並得出許多不同的結論：經濟發展的解釋、文化變遷的解釋、政治精英的協商、政治精英的分裂、社會結構的變遷、國際格局的變動、鄰國的傳染效應……這些研究都極其寶貴，共同構建了一個轉型動力學圖景。然而，眾所周知，「步入婚姻的殿堂」之後未必是「幸福的生活」，有時候甚至「婚姻是愛情的墳墓」。民主轉型之後出現的也未必是民主穩固，有可能是民主倒退和崩潰，甚至可能是戰火紛飛。「句號」並非真的句號，而是意味深長的省略號，對這個省略號，我們所知甚少。

本書試圖在 20 世紀末 21 世紀初的時間框架中分析這個省略號。確切地說，本書試圖分析這個階段中的新興民主國家在轉型啟動之後所發生的事情，即，「巨變第二天」的情形。踏上了轉型的道路之後，這些國家的民主是否走向了穩固？還是出現了——如近年媒體廣泛討論的那樣——民主的普遍衰退？其經濟表現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是否像

很多人預言的那樣，廣泛出現了「劫富濟貧式的多數暴政」，也就是經濟民粹主義泛濫成災？暴力衝突水平如何變化？是如樂觀主義者所期待的那樣，以「算人頭」替代了「砍人頭」，還是如悲觀主義者所感受到的那樣，成了族群衝突的「魔法按鈕」？國家能力又如何變化？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國家能力對於治理績效的基礎性作用，並因此得出「國家優先」的發展順序論。從新興民主國家的角度來說，在多大程度上這一「順序論」得到了驗證？以相關數據庫提供的信息為依據，本書的前半部分試圖就上述問題進行一個全景式的分析。

本書的後半部分，則試圖從轉型後「發生了什麼」這一問題轉向分析「為什麼」——確切地說，為什麼有些國家能夠實現相對平穩的政治轉型，而另一些則走向了民主衰退或崩潰？並且，在這一過程中，往往伴隨着衝突不斷和經濟危機？如何解釋這些差異？既有的經濟水平解釋、社會結構解釋、制度選擇解釋、國際環境解釋、文化傳統解釋……能否提供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框架？如果不能完全解釋，有什麼重要因素被遺漏？它為什麼重要？以及它與既有的解釋框架存在什麼聯繫？

將分析的重心從「轉型動力」轉向「轉型穩固」並非僅僅出於個人偏好，而是「現實所迫」。什麼現實？諸多轉型國家所遭遇的困境、挫折甚至戰亂，以及由此引發的觀念迷惘。《經濟學人》在2014年的一篇社論中寫道：「民主正在經歷一個艱難時世。在那些獨裁者被趕跑的地方，反對派大多沒能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即使在那些民主得以建立的地方，系統的缺陷令人擔憂地顯現，對政治的幻滅也隨處可見。但就在幾年前，民主看上去似乎將統領世界。」（*The Economist*, Mar. 1, 2014）

這段話顯然事出有因。近年的各種時事顯示，諸多新興民主的轉型歷程坎坷動盪。在阿拉伯地區，「阿拉伯之春」中的民主轉型遭遇了幾乎是全軍覆沒式的失敗。在拉美，民主轉型與其民粹主義傳統的結合致使數個大國出現經濟危機甚至崩潰。在非洲多個國家，周期性民主選舉成為周期性族群衝突的導火索，以至於在某些地方投票成為騷亂集結號。甚至在西方的邊陲地帶——中東歐、南歐、西亞，似乎已經塵埃

落定的民主轉型被重新打上問號：東歐的民粹主義崛起、南歐的債務危機、土耳其的民主倒退都為「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之敘事蒙上了巨大陰影。

然而，政治學思考不僅僅是「時事分析」。代議民主政體的浪潮式湧現在人類歷史上是「千年未有之變局」，以五年、十年、二十年的趨勢去分析這場「千年變局」的成敗得失，是過短的觀察尺度。視野過短之後果，是觀察者容易因為時事「風向」成為過度的樂觀主義者或過度的悲觀主義者——有趣的是，他們常常是同一批人。風向是代議民主制的多米諾骨牌式勝利時，很多人傾向於將民主視為「聖誕老人」式的魔術師，其紅色口袋裏裝滿了人們所期待的一切禮物；而當風向轉為民主轉型的廣泛受挫時，他們轉而憤怒，繼而將民主看得一無是處。這一點並不奇怪。過高的期待帶來幾乎是必然的失望，激進的樂觀主義，往往最快地轉變為徹底的悲觀主義。

或許歷史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當人們哀嘆代議民主淮南為橘、淮北為枳時，似乎假定民主在西方世界的生根落地一帆風順。但這並非事實。事實是，歐美國家的民主化歷程充滿血雨腥風，其程度比之今天的新興民主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以法國為例，1789年大革命是其民主化的第一次努力，其間出現的內戰、對外戰爭、恐怖統治舉世皆知，後果則是政治強人回歸和帝制復辟，用今天的語言來說，是典型的民主崩潰。此後法國的政治轉型仍然是一波三折。1814年的復辟之後是1830年的七月革命，路易·菲利普一世 (Louis Philippe I) 半心半意的改革最終引發了1848年革命，法國第二共和國誕生。然而，路易·波拿巴 (Louis Bonaparte) 又於1851年通過一場「公投」推翻了共和政體，很大程度構成準民主政體的「自殺」。普法戰爭的失敗和路易·波拿巴的倒台又觸發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之後是法國第三共和國的誕生。然而，第三共和國也危機不斷，社會撕裂嚴重，一戰和二戰的災難使這種脆弱性一覽無餘。甚至到二戰之後，1958年的阿爾及利亞危機再次引發政變危機，之後法國的民主體制才真正走向穩固，而這時距離法國大革命已經過去了一百五十多年。

法國歷史顯示，專制往往並非地震式「坍塌」，而是一層層被「剝離」。1789年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革命，每一次革命「剝去」一層專制制度，而歷史往往進兩步退一步，最後還要輔以有利的國際環境和漫長的文化變遷，才最終使得民主穩固「塵埃落定」。事實上，直到今天，「塵埃落定」這個詞仍然顯得為時過早，無論是右翼「國民陣線」的崛起，還是左翼「黃背心運動」的興起，都顯示即使在法國這樣一個貌似「政治文明已經翻篇」的國家，兩極對立仍然可能激化，歷史的頁碼仍然可能被新的風向重新翻亂。

法國的故事並非孤例。檢視美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甚至英國歷史，幾乎沒有哪個國家的民主轉型一帆風順。德日意的法西斯主義興起自不待言，美國革命或者西班牙內戰也是舉世皆知，即使英國的光榮革命被視為「和平演進」之典範，其實也未必那麼「和平」——如果沒有之前英國內戰、克倫威爾獨裁和復辟帶來的勢力均衡，「不流血的革命」也恐怕難以發生。摩爾在其經典著作《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中，將第一章命名為「英國與暴力對於漸進主義的貢獻」(Moore 1967: 2012)，正是試圖說明這個道理。根據英國歷史學家卡爾頓的估算，英國內戰在全國導致大約8.5萬人戰死、10萬多人因與戰爭相關的瘟疫病死，加起來近19萬人，從當時的人口比例來看可以說非常驚人(Carlton 1994: 211)。因此，當今天無數人為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的轉型受挫而驚愕時，或許更令人驚奇的，不是今天的新興民主轉型如此艱難，而是人們竟然認為它不應如此艱難。

恰當的歷史教訓或許是：當專制的遺產積重難返，政治的每一點進步都可能代價慘重。制度的「排異反應」不僅僅存在於不同「水土」之間，也存在於甚至更存在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當新觀念衝擊舊觀念、新利益團體威脅舊利益團體、新的權力主體驅逐舊的權力主體，當一個全新的遊戲規則出現，而支撐這個遊戲運行的政治文化尚未成型，痛苦和混亂幾乎是必然，區別只在於混亂之後是新生還是更大的混亂。在這一過程中，轉型的難度與轉型前專制的深度極有可能成正比。

或許以西方歷史來比照今天的新興民主，標準不是太高，而是太低。畢竟，今天的國際體系不同於18、19世紀，所謂「自由霸權」的確立與當年反法同盟對法國革命的圍剿不可同日而語，政治知識的歷史積累程度也大相逕庭——第一個攀登珠峰的人和第一萬零一個攀登珠峰的人危險係數自然不同，而全球化所帶來的觀念擴散以及經濟聯繫，使得制度學習的成本大大降低……也就是說，我們本來有理由期待新興民主的轉型更順利、「水花更小」，也正是因此，其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困境更加令人措手不及。

然而，正如奧唐奈多年以前所指出，民主穩固並非民主轉型的「宿命」，這既是因為歷史的走向沒有「宿命」，而是一系列「條件」與「選擇」相互碰撞的結果（O'Donnell 1996）；也因為即使是今天，歐美世界的民主制度依然面臨重重挑戰，在這個意義上轉型沒有「完成式」。然而，即使我們知道某國政治轉型將在一百五十年後、三百年後「塵埃落定」，我們仍然希望這一過程的時間不那麼漫長、道路不那麼曲折、過程不那麼慘烈，因為歷史的任何一個微小「褶皺」都可能意味着個體命運的驚濤駭浪。凱恩斯說：「長遠而言，人都是會死的。」長線的分析或許有學術意義，而對於生命短暫的每一代人，他們尋求的是如何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進步，是「只爭朝夕」。

這也是為什麼系統地對新興民主的成敗得失進行階段性梳理至關重要。由於分析對象涉及近百個轉型國家，而分析維度則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本書所承載問題的重量遠遠超出筆者的學力，然而這些問題如此之重要、之迫切，對於比較政治學者，將判斷僅僅留給意識形態偏見和新聞標題所帶來的「印象」是如此之失職，我仍然願意知難而上，進行這場知識上自不量力的冒險。

本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致力於分析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進展及其後果：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底進展如何？這股浪潮如何影響了被捲入國家的一些關鍵治理績效？是增加、減少了抑或並沒有顯著改變暴力衝突水平、經濟自由度、經濟增長狀態以及國家能力？總體而言，第

一部分試圖對第三波浪潮及其後果進行一個全景式的深描，以理解這場歷史巨變在近50年的時間裏對相關國家的政治圖景造成了什麼樣的衝擊。這種描繪之所以必要，是因為任何理論分析和價值判斷必須建立在事實釐清的基礎之上，否則錯誤的診斷必然導致錯誤的藥方，比例扭曲的地圖必然導致輪船的偏航。

第一章試圖描述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宏觀輪廓：其覆蓋面、空間和時間上分佈的特點，走向民主穩固和民主倒退的比例。本章尤其着重分析一個近年越來越受熱議的問題：在新興民主中，是否存在顯著的民主衰退？在哪些維度上的確出現了民主衰退，又是在哪些意義上，新興民主顯示出相當程度的韌性？此外，本章試圖將讀者的注意力導向新興民主中兩個越來越突出的現象：「中間政體陷阱」以及頻繁的「政體震盪」現象——在多數國家已經加入民主化的浪潮後，「民主—威權」的二分法已經無法捕捉轉型現實的複雜性，而「陣痛」這樣的詞語也無法表現中間狀態的「常態化」，因此關注分析轉型的「灰色地帶」就變得格外重要。

第二至四章則分別分析轉型後新興民主在大規模暴力衝突（第二章）、經濟表現（第三章）和國家能力（第四章）方面的變化，以及民主轉型與這些變化的關係。第二章從「民主和平論」和「民主衝突論」的理論之爭出發，在相關數據庫的基礎上檢視轉型前後大規模暴力衝突水平的變化，並以三個案例呈現變化的三種方向及其背後的邏輯。第三章則試圖描述轉型前後經濟表現的變化。鑒於經濟自由對於經濟發展的根本性作用以及「民主化帶來殺雞取卵式的大多數暴政」之流行看法，本章尤其關注新興民主的經濟自由度變化，在此基礎上再觀察各國經濟水平的變化。第四章則圍繞一個近年引人注目的理論爭論展開：政治發展是否應當遵循「國家優先」的「順序」？帶着這個問題，本章分析各國民主轉型後國家能力的變化——在此，筆者將國家能力拆解為財稅能力、強制能力和行政能力三個維度，分別觀察其變化趨勢。

為充分把握第三波浪潮中的上述變化，在每一章中，筆者都從橫向比較、縱向比較、因果分析三個角度去考察分析對象。所謂橫向比較，即比較民主轉型國家、穩定威權國家和穩定民主國家在同一個時期的暴

力衝突水平、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國家能力方面的均值變化趨勢。所謂縱向比較，即聚焦於第三波國家，以轉型啟動年為分界線，分析各轉型國家中上述治理指標在轉型後是有所改善、惡化或基本不變，並從中分析改善者、惡化者和基本不變者的比例關係。所謂因果分析，則是以第三波國家不同的政體狀態為自變量，以上述治理指標為因變量，在控制相關變量的前提下，去分析治理績效的上升或下降能否歸功或歸咎於政體狀態的變化。

顯然，面對近百個參差多態的國家，筆者無力也不可能一個一個「寫生」，因此，上述分析主要借助於既有的數據庫，比如，記錄政體及其變化的「政體數據庫(第五代)」(Polity V)和「多樣的民主」數據庫(Varieties of Democracy)，囊括各種治理指標的「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體現經濟自由度變化的「經濟自由度指數」(Economic Freedom Index)，記錄大規模暴力衝突的「武裝衝突數據庫」(Armed Conflict Dataset)和「政治暴力重大事件」(Major Episodes of Political Violence)，體現國家能力的稅收/GDP比值等等，對此各章節皆有具體說明。

本書的第二部分則試圖從「發生了什麼」這個問題轉入「何以如此」的問題：為什麼一些新興民主走向了相對的民主穩固，改善了治理績效，而另一些則出現了民主倒退，甚至治理惡化？「硬著陸」和「軟著陸」的分叉何以出現？與既有的經濟發展視角、經濟平等視角、社會結構視角、制度設計視角、國際環境視角不同，本書的第二部分試圖聚焦「觀念的視角」，確切地說，試圖論證兩種不同的民主觀——自由式民主觀與民粹式民主觀——如何通過塑造不同的政治模式、經濟政策和公民社會形態影響民主的穩固及績效。不滿於既有分析中的「決定論」色彩，筆者強調「觀念帶來選擇，選擇影響後果」，以此重新激活轉型政治學分析的政治意涵。

不過，在本書中，觀念的視角並非「平行於」其他視角的「另一種視角」，而是試圖在既有的各種解釋中找到一個更「上游」的解釋：在筆者看來，經濟水平、經濟結構、制度選擇、甚至政治文化……並非靜態

變量，而常常是政治選擇的後果，而選擇則往往來自於一個社會廣泛存在的——尤其是其積極行動者的意識形態。2010年代委內瑞拉經濟自由落體式的跌落，並非一種歷史給定的「經濟基礎」，而是一系列政治選擇的後果；前南斯拉夫地區在20世紀90年代的戰火紛飛，也未必是因為不同族群歷史上不可化解的血海深仇，更多的是源於煽動性的政治動員。「結構性因素」約束政治選擇的半徑，觀念驅動的政治選擇則撬動「結構性因素」的流變。

第五章在回顧既有文獻的基礎上引入「兩種民主觀」的視角。本章在回顧民主穩固的常見既有解釋及其預測力「失靈」現象之後，轉入對「兩種民主觀」的討論。思想史上向來有「厚的」和「薄的」兩種民主觀之論爭，本章對其做簡要梳理，並以「民粹式民主觀」和「自由式民主觀」命名這兩個傳統。在此基礎上，本章從民主的目標、民主的主體、民主的邊界、民主的標準和民主的手段五個方面出發，去辨析這兩種民主觀的不同。這種區分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民粹式民主觀製造「承諾的漩渦」，導致「預期的超級通貨膨脹」，從而損害民主穩固的前景，而自由式民主觀或許因其精英主義色彩看上去「不那麼民主」，卻因其更有節制的承諾具有更細水長流的生命力。

第六至第八章則展開論述何以不同的民主觀帶來不同的民主穩固表現。在第三波「民主衰退」中，新興民主的倒退與崩潰主要有三個路徑：政治路徑、經濟路徑以及社會路徑。固然，在現實中，一個國家常常被這些問題同時纏繞，但是，為透視不同機制的展開邏輯，第六到第八章分別分析這些路徑的發生機制。每一章都從第三波國家廣泛存在的某個「問題」開始，然後分析「民主觀念」如何導致這個問題，進而分析這個問題又如何危及民主穩固的前景。最後，每一章都通過正反兩個案例分析展示「民主觀念 → 政治/經濟/社會模式選擇 → 民主穩固」的邏輯。

第六章的切入問題是：何以在新興民主中大量湧現「強人政治」現象——或者說「不自由的民主」現象？與常見的「專制遺產論」和「個人野心論」不同，筆者強調政治強人崛起的「民主邏輯」：他們往往通過民主選舉上台，通過民主渠道擺脫權力制衡，並在民眾的「擁護」下中迫

害反對派。然而，這並非民主的必然，而是民粹式民主的必然——恰恰是民粹式民主中一元化的人民觀以及「民意」的神聖化，為政治強人的崛起鋪平了道路。本章從政治過程的不同環節展開討論，並以南非和津巴布韋兩個案例進行闡釋。

第七章的切入問題則是：為什麼新興民主中很多國家採用民粹主義經濟政策？同樣，本章首先分析不同經濟政策的觀念起源，然後論證民粹主義經濟政策如何通過「政治反彈」和「經濟危機」兩個路徑影響民主的穩固和治理表現，並以相關數據和兩個案例分析（智利與委內瑞拉）支持這一看法。借助一些案例國家的憲法文本以及世界觀念調查的數據，本章試圖呈現，對「權利」與「善」的混淆帶來一種「無邊權利觀」，「無邊權利觀」導致激進的民粹主義經濟政策，從而威脅民主穩固的前景。

第八章則從這個問題出發：為什麼在許多新興民主，積極熱烈的政治參與未能護佑民主走向穩固，反而加速了其崩潰？新興民主的倒退乃至崩潰不僅可能自上而下地發生，也可能自下而上地發生。發達的公民社會通常被視為民主有效運轉的必要條件，諸多新興民主中的失敗案例則顯示，過於活躍的公民社會未必是推動民主穩固的積極力量，必須對公民社會的行為模式進行細分，才能辨析它與民主穩固的關係。基於民粹式民主觀的公民社會，其行為模式傾向於剛性，而基於自由式民主觀的公民社會，其行為模式則更具彈性，剛性與彈性兩種行為模式對民主穩固前景造成不同的影響。本章分析其中的邏輯，並以泰國和印度尼西亞兩個案例進一步闡釋。

毫無疑問的是，那種認為「扔到水裏自然就會游泳」的轉型觀過於浪漫。事實是，如果泳姿錯誤，如果體力羸弱，如果執意游向危險地帶，「扔到水裏」後發生的不是「學會游泳」，而是「淹死」。每當一個威權政體陷入危機、走向崩潰，無數人歡欣鼓舞，卻忘了在人類歷史上，取代專制的，更經常的是另一種專制——有時候甚至是更深的專制，或「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無政府狀態。在這個意義上，民主的穩固從來並非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它是一個知識問題，需要人們有足夠的智慧去辨析民主運轉的條件；還是一個「勞作」問題，需要所有

人——不僅僅是統治者——去翻土、澆水、施肥、修剪、耕耘；同時也是一個耐心問題，作為一種重複博弈的遊戲規則，民主並不假定民眾道德或知識完美，只是承認——當試錯機制被制度化——集體理性演進之可能。

反諷的是，從歷史上被傾覆的民主來看，或從當代新興民主的命運來看，在漫長艱難的轉型過程中，轉型最致命的陷阱未必是「權慾熏心的獨裁者」，而常常是「完美民主」的誘惑：人們以「真民主」的名義去摧毀所謂「假民主」，用「更深民主」的名義去否定所謂「表像民主」，用「大眾民主」的名義去攻擊所謂「精英民主」。總之，以民粹式民主去摧毀自由式民主。換言之，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摧毀民主的就常常不是專制，而恰恰是民主自身失去節制。

民主從自由走向民粹，是否是「歷史的必然」？這一危險顯然真實存在。在一個權利意識覺醒的時代，獨裁易辨識，腐敗易詛咒，然而，「善」的誘惑如此具有感召力，反而可能驅動人們棄守政治之邊界。然而，政治沒有「宿命」。即使在同一個民主國家，人們也常常在左右之間搖擺，而在不同民主國家之間，政治光譜更是千差萬別。決定這些搖擺與差異的，觀念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極具能动性因而值得深思的視角。在這個意義上，對於一個國家，觀念即其命運。

某種意義上，經驗分析是速朽的，因為它所立足的經驗世界處於時刻的流變中。然而，經驗分析的謙卑也正在於此，它朝新的事實敞開，並不宣稱抵達永恆的真理。因此，本書不敢聲稱「發現」了什麼確切的事實或理論，而只是為特定假說提供了一些實證線索。然而，這種不斷自我更新甚至自我摧毀的知識建構過程並非徒勞，因為恰恰是這種西西弗斯式的努力防止了知識固化。至少就政治領域而言，知識固化是危險的——如果知識是確切的，那麼極權就是必要的。除非意識形態上自我催眠，否則在一根無盡的鋼絲上行走，是一個政治思考者的責任。這固然令人疲勞，但是面對這樣一場「千年未有之變局」及其所裹挾的無數人的命運，這種疲勞是值得的，而對於一個學者而言，甚至是令人歡喜的。